

中国

社会

语言学



郭 熙 /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

社会语言学

郭熙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我们交流科学知识的唯一工具——语言，从起源和主要功能来看，本质上都是社会的。

——伯特兰·罗素

唯有研究语言的社会作用，才能懂得语言的本质。

——J. 旺德里叶斯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对象.....	(1)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和相关学科	(12)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	(18)
第一章 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34)
第一节 语言、方言和民族共同语.....	(34)
第二节 语言观和语言态度	(46)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的类别	(59)
第四节 中国的语言国情和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任务	(61)
第二章 社会变迁和汉语的发展	(67)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语言变化的关系	(67)
第二节 社会文化接触和汉语的发展	(72)
第三节 现代中国社会分化和当代汉语的形成	(80)
第四节 从“文革”语言看社会政治运动对语言的影响	(91)
第五节 社会人口变动对语言的影响	(96)
第三章 语言的社会变异	(105)

第一节	社会范畴	·····	(105)
第二节	政治语言和社会流行语	·····	(115)
第三节	秘密语	·····	(122)
第四节	语域:以新闻语言为例	·····	(126)
第四章	语 码	·····	(134)
第一节	多重语码:现代社会的必然	·····	(134)
第二节	语码的选择:社会的和个人的	·····	(140)
第三节	语码的混合、混用和转用	·····	(145)
第四节	语码的转换	·····	(152)
第五章	汉语和中国社会结构	·····	(161)
第一节	语言对社会结构的反映	·····	(161)
第二节	语言对家庭的反映	·····	(176)
第三节	人名	·····	(182)
第四节	地名	·····	(188)
第六章	语言迷信	·····	(192)
第一节	语言的功能和语言的神秘化	·····	(192)
第二节	禁忌语、委婉语和詈语	·····	(203)
第七章	语言规划和语文生活	·····	(213)
第一节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	(213)
第二节	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规划	·····	(220)
第三节	建国后的语言规划	·····	(224)
第四节	当前我国的语文生活	·····	(231)
第八章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程序和调查方法	·····	(244)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程序	·····	(244)
第二节	定性、定量研究以及抽样的方法	·····	(250)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研究人员的素养	·····	(256)
参考文献	·····		(261)
索 引	·····		(271)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对象

一、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们通过语言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活中语言犹如空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正因为如此,自从出现了语言,人们就开始谈论语言,并逐步地从各个角度研究语言,探讨和语言相关的各种现象。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角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去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可以看出,“不同社会条件”是一种变素,而“语言变异”也是一种变素,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语言学看成是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共变的一门学科。

作为一门学科,我们在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语言在社会中的各种功能的时候,首先应该给涉及到的有关方面下定义。

先说“社会”(society)。中国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社会“就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张克荣,1988,页53)。这个定义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属性。但从社会语言学的关注点来看,换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可能更方便。例如,可以把它定义为“任何为某种或多种特定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群体”(Wardhaugh,1986,页1)。这个定义的内容比较复杂,但是很有用。因为在讨论社会语言学时必须考虑到多种多样的社会,多种多样的社会集团。在我国历史上,除了

较早时期以外，“社会”一词一直是与集团有关的。对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或许是它的“本质属性”，但对于我们来说，更关心的是它的群体性和集团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地给语言下一个定义：语言（language）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的成员所说的话。对局外人来说，这个定义是简明扼要的。但学习过语言学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个定义隐含的内容非常复杂而且有不少缺陷：因为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里，语言都在使用不同的形式。而且，当我们试图去描写一个社会的语言的时候，能拿来讨论的“语言”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语言不是加给人类世界原已存在种种事物的标记或名称的单纯汇集。每一社会集团都生活在多少不同于其他言语社团的社会中，这些差别既反映在言语社团的文化组成成分中，也反映在它们的语言中。有时候，一个社会是多语的，许多人会使用不止一种语言；而同一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语言。

语言和社会不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可以假设出的语言和社会间的关系就有以下几种可能性（Wardhaugh, 1986, 页 1）：

- (1) 社会结构影响或者决定语言结构和(或)行为；
- (2) 语言的结构和(或)行为影响或决定社会的结构；
- (3) 语言和社会相互影响；
- (4) 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没有关系。

事实上，语言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它既起源于物种的和个体的发生，也起源于全人类的进化和每个人的生命史，也起源于社会交际行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语言是人类通过交际以应付生活和世界的前语言和原始语言这个序列的产物。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将把我们引入一个广阔的研究天地。

二、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

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人对这门学科有不同的理解。

1. “分支”说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语言学就是“社会+语言学”。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这里以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R. A. 郝德森(1990,页8)为代表。他说:

我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一门学科”,意在表明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部分。因此,社会语言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揭示一般语言的性质或具体语言的特征。正如我们所期望的,研究社会的学者发现,语言事实对于他们认识社会很有启发作用——要找到任何像语言这样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社会特征,毕竟是很难的。对于通常所称的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可以定义为“联系语言研究社会的一门学科”(与上面的社会语言学定义相反)。

他还对这两个学科的区别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

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着重点不同,它取决于研究者对语言还是对社会感兴趣,同时取决于他专长于分析语言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二者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区域,因而对二者作出比目前更为明确的区分看来是没有意义的。

郝德森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没有意义,为什么又要去区分它呢?

2. “两属”说

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尤尼斯·D. 德舍里耶夫(Yunus Desherievich Desheriev, 1985)则提出了一种两属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语言学不仅仅属于语言科学的范围,它诞生于其他学科之间,是一门学科际的学科”。在语言学里,他赞成区分语言学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把它们作为语言科学的组

成部分,这就是结构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二者研究的是同一对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人们一旦企图划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便破坏了语言学科内部上述两个部分的有机结合。

3. “语用”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佐伊基(Arnold M. Zwicky,1989,页2)则提出了最狭义的社会语言学观。他认为,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 who says what to whom on which occasion(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什么)。what 是社会语言学的语言部分,who says what to whom 包括了使用语言的人。occasion 是关于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人与社会情景合起来就是社会因素。社会语言学一直想回答的就是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谁对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语言与语言情景的关系。他设想了一些总原则,这些总原则所说的是语言与使用者、语言应用与情景的关系。要是没有这些总原则,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就没有意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Zwicky 的社会语言学有点像语用学,可以称之为“‘语用’说”。

4. “应用”说

陈章太和陈建民(1991)提出中国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他们认为,我国有丰富的语言宝库,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表现在高度重视自己的语言发展变化,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文化共存的一门应用学科。我们认为,结合一个具体的社会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由于社会语言学的跨学科性质,它与社会使用语言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明显,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就认为它是一门应用学科。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工程方面。它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或许更具理论意义。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应该由应用语言学来承担。因此,与其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一门应用学科,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

5. “边缘”说

陈原(1983,页1)提出了“共变论”,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边缘学科。他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作为边缘学科的。1987年,在中国首次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陈原再次指出: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多学科性交叉学科;从它发展的趋向来看,它不只是社会科学若干学科的交叉,而且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接合部之一。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国土学,心理学,概率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神经科学等等学科,都会在这个接合部中发挥作用,形成一个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语言学也不例外,它已经并且继续在我们这里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德国社会学家、世界社会科学联合会所属社会语言学研究委员会主席T·勒克曼(Thomas Luckmann,1985)也持这种观点。

我们原则上同意陈原“共变”的观点,但不赞成把它的“接合部”扩散得无边无际。作为边缘学科,社会语言学当然要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涉及到各个学科。但是,社会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仍应是社会和语言密切相关的一面。有的方面不一定是接合的问题,例如社会语言学可以使用一些统计学的方法,要对语言进行一些定量定性分析,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它和这些学科的接合,就像我们在许多学科里都要利用数学而不说数学和该学科构成边缘学科一样。我们认为,和社会语言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是社会学,但社会语言学也不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的简单相加。社会语言学之所以成为边缘科学,是因为它是社会学和语言学都关心的学科。因此,社会语言学既不从属于语言学,也不从属于社会学。它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社会语言学不是语言社会学的相对的概念,它和结构语言学虽然也有重大的差异,但它们之间也不是相对的关系。如果我们借助层次分析法的话,社会语言学不能分析成

“社会+语言学”，而应分析成“（社会+语言）学”。

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还因为“社会+语言学”的说法似乎在暗示有非社会的语言学的存在。既然语言是社会现象，在本质上是社会的，那么就没有社会以外的语言学的存在。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把它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区别开，那还是有道理的。从研究对象看，社会语言学不但要研究语言和客观的社会诸因素（如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研究主观的社会诸因素（如社会态度、社会价值等）在语言和言语活动中的反映。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对语言使用受社会制约这一现象感兴趣的学科越来越多。

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使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泛化，最后走向不同的研究领域（蔡富有，1991）。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那样，社会语言学之所以诞生，实际上是对语言研究脱离社会的一种反动。不同的人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社会语言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语言学所必须经过的一条道路。语言研究要同社会结合起来，要为社会服务。如果社会语言学不关心社会，还只是局限于微观的分析，就很难说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社会关心是多方面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一门刚刚建立的学科就被范围限制住，就谈不上这个学科的发展。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担心社会语言学的范围问题，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正如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范围很广而又有很多分支的学科一样。

当然，近年来对语言运用受社会制约这一现象感兴趣的不仅是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甚至精神病学家等，对此都很感兴趣，使得这门新兴学科的界限有点模糊不清；但从中国的总体情况来看，有两点比较清楚：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微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它研究各种社会因素（语言集团的各个阶层）对语言结构及其历史演变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普

通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它比较分析各种言语活动、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发生在各种特定语境里言语所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Fishman, 1976）。社会语言学应该回答语言学关心但是仅从语言本体研究无法回答的有关问题。

从上述认识出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因为过去所作的所有关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都可以看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作为现代社会语言学，它自身又有着明显的特点：它不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相关领域的简单机械的结合，不只是在语言学的前面加上个“社会”的标签，而是在统一的理论、对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认识、统一概念体系和共同研究程序基础上的结合。它是一门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当然，这一结合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一完成过程就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社会语言学虽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还很不成熟，这从前面提到的许多争议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语言学更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意义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

（1）拓宽了语言的研究领域，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有用的概念。除了方言学家外，传统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是拟想的单一纯净的语言。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单一的，是有变异的；变异又分地方性的（这是古人已经注意到的）和社会性的（这主要是社会语言学的贡献）。社会性的变异分为社会阶层的变异（上层、中层、下层等）；职业的变异（教师、律师、医生、军人等各自的语域）和语用性的变异（在家里、在办公室、在讲台上使用的不同的语码）。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仅限于语言的内部关系，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语言外部关系着眼，后者的活动开拓了新的领域。

过去我们认为语言的变体是自由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不自由,有时甚至是强制的。社会语言学所总结的规律可以帮助其他学科的研究,可以帮助解释我们过去认为是自由变体的例外的东西,如语法方面的例外,常常是社会结构的差异所引起的。再如儿童的语言,成人不说。社会语言学家所采纳的一个程序是把旧的生成规则拿来,改写成受社会语境制约的“可变规则”(variable rules)。最初,转换的规则或是强制的,或是任意的;如果是强制的,说话人必须遵守;如果是任意的,他们也许遵守规则,也许不遵守。至于“也许或也许不”所应用的条件是什么,并不去考虑。社会语言学则承担了解释这一条件的任务。

(2)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数量化的概念。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里唯理语言学提出了形式描写的概念;社会语言学提出了数量化的概念。后者以一个具体的社团或行业、或公共场所、或年龄段为调查对象,根据拟定的调查项目取得关于一定的语言现象的调查数据,从而对正在演进中的语言变化作出数量化的概括。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和英国语言学家 Trugile 所作的调查,都各有上千个数据,作出了细密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3)在历时和共时之间提出了一个中间概念,把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自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历时和共时的理论后,人们一直沿用不疑。但是,时间是瞬息即逝的,语言是不断发展和变异的,纯净单一的共时只能是心理现实(一种拟想),不可能是客观存在。对此,社会语言学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社会语言学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选择祖宗三代或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受试者,调查他们之间的语言变异,从而用共时的研究方法取得历时的研究数据,可以说是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2. 社会语言学的实践价值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走出象牙之塔、走出经院、深入社会、深入人民群众的产物。它的兴起促使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语言。在此之前人们只是从语言的系统、交际功能、表达功能等方面来认

识语言,对社会生活提出的实际问题注意不够。例如,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即规范化和标准化就曾缺乏社会的通盘考虑,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政策的制定、方案的选择、措施的采取方面常常陷入一种盲目的状态。而社会语言学从社会、民族、人类等的角度考虑语言,把语言作为国家、民族的文明程度的标志,把语言研究作为信息时代的要求,开展调查、统计、分析、研究,逐步地引起社会的重视;它不仅仅停留在研究本身,而且还注意使语言在生活中起到应起的作用,进而也丰富语言学本身。这是社会语言学实践意义的集中的体现。这不由使人想起法国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1924)曾说过的话:“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种语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见岑麒祥,1988)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语言的其他方面,例如语言作为一种资源(邱质朴,1982),语言作为一种产业。更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了语言的市场价值(陈建民和祝畹瑾,1992)。这显然是由于市场经济模式的出现人们才认识到的。他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决定了语言的市场价值:(1)对某种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供求关系;(2)操某种语言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3)掌握某种语言后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奚博先(1993)则又指出,语言是生产力,语言和吃饭有很大的关系。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同意这一观点。但在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史上,确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语言的这些价值,事实上人们很早就已经在运用这个杠杆,只是人们没有从理性上予以认识,也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进行阐释罢了。周有光(1995,页126)指出,英语是当今世界上最赚钱的语言(money language)。而7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许惟贤,1990)。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近年来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1995年,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达3.7万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近年来

华学汉语人数的递增率还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在本国的大学或中学设立汉语专业或开设汉语课程,我国每年都要派出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到有关国家任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是语言市场驱动的结果。

具体说来,社会语言学的实践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制订语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语言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社会形形色色,但总要以始终连续的合作与交往为基础。由此带来的社会方面的任务,既有语言的大的方面的问题,如官方语言的选定,民族语言的使用,语言文字的立法,语言规范的确立,语言和方言的保护等等。也有小的方面的问题,如语言的培训、语言行为规范的指导、术语的规范问题——应该采用哪种说话方式和语言变体,理由何在?是否可以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这类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主观的想法或偏见而定,而传统上这种偏见起过不小的作用。正确的做法显然是应该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有科学根据的评价标准和相关的学术研究。语言政策的制定必须从语言国情出发。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有助于语言国情的认识,从而为制定正确的语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有助于解决一些因语言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2)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和资料。社会语言学对教学的作用很能说明社会语言学的实用价值。以第二语言教学为例。一般认为,衡量语言的恰当程度的最可靠的标准就是由说本族语的人来看,学生的语言实践是否可以接受(玛丽——路易斯·卡内,1985)。例如,我们对一个美国人说的汉语作出评价说“他的汉语说得像中国人”,这意味着对这个人的汉语水平的高度赞扬。它表明,这个人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汉语。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所注重的并不一定是他的语法的正确、发音的标准、词汇的丰富;而更重要的或许是注重了他能够在不同的语境里选择不同的句型和词汇,用得恰到好处。这说明,语言必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使用,学习这一语言的人必须了解这一环境,以便恰当得体地选择语言形式。社会语言学强调

交际是由语言和语言环境两者组成的。它的教学方法的优点是师生必须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真实的交际场合,可以对学生所使用的语言是否恰当提供明确的指导,借以使学生得体地运用语言。因此,社会语言学对课程计划的制订有着很大的贡献,它可以使人认识到:语言材料和语言环境两个方面都必须受到重视;在学习以及运用阶段,两者必须保持平衡。如果某种语言的老师懂得该语言的各种变体以及对待这些变体的态度,他们就能很好地完成上述各项任务。

(3)有助于认识社会文化和历史。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早在19世纪时就认为:“在没有书面语文献以前,我们要找出任何民族的历史,语言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因为这个民族的宗教、风俗、法律和制度尽管起变化,而它的语言却常保存下来,虽然不是没有改变,可是甚至在几千年后还可以辨认出来。”(见岑麒祥,1988,页103)

罗常培(1989,页88)说:

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

根据语言的“遗迹”,我们可以探索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以词汇研究为例。我们考察了建国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发现绝大多数新词都是名词。如果把一本新词词典中所有的词按照出现的年代排起来,几乎可以看作一本编年史。又如,《说文》中“女”、“车”、“马”、“鱼”、“玉”、“贝”等部首的字相当多,这反映出上古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产的变革、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重要特色。此外像成语、谚语、外来词等也都能反映出来不少历史和文化现象。

由此可见,从研究语汇的出现、变化、派生、消失等语言现象着手,去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动,是有可能的,有必要的(陈原,1983

年,页 266)。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和相关学科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多边现象,体现于生理、心理、社会习惯和其他形式之中,而社会语言学更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和许多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显然是由社会语言学本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一位朋友向我提出,社会语言学应该只研究语言,并建议要把这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这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否则,我们就很难建立社会语言学的体系。

一、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

国外无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与它相近的是人类语言学。中国一些学者 80 年代提出建立这一学科,并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按照这些论著,文化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关系学科。

由于对社会语言学的性质范围等问题意见分歧,加上社会和文化的密不可分,这就导致了难以从理论上说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关系。从具体的论著来看,很多社会语言学论著都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纳入自己的范围;反之,许多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论著,也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纳入自己的范围。人们目前有这样几种观点:(1)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是不同的学科,二者有合流的趋势,但今后怎么发展,目前还很难预言(邢福义,1990,页 33);(2)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这意味着它可以涵盖社会语言学(申小龙,1991^②);(3)社会语言学是公认的学科,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研究但不应该建立文化语言学(伍铁平,1997);(4)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等趋向于“分”(高一虹,1996)。

我们认为,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都是正在发展的学科,学

科间出现一些交叉在所难免,不宜轻易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我们也不能因社会语言学相对比较成熟,而国外没有文化语言学就否定后者。邢福义等(1990,页33—34)对这两个学科所进行的比较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邢先生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下面予以介绍。

(1)社会语言学一般以一个社会内部的言语共同体的语言状况为研究对象,而不太关心不同社会的语言状况的系统比较;而文化语言学除了研究社会内部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之外,还要研究比较不同社会的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的异同。

(2)社会语言学主要关心语言的现状,只有在说明语言的社会变异的前因后果时,才涉及它们的历史。联系人文历史现象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而文化语言学不仅关心语言和文化的现状,而且非常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如关于词源、字源与文化史的关系,就是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3)“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尤金·奈达,1985)简言之,社会语言学主要关心的是言语交际方式的选择及其社会条件和社会意义,而不太关心语言结构体系本身。比如,社会语言学特别关心个人或言语共同体进行言语交际时,采用什么语言变体,是母语还是外语,是标准语还是方言,是正式语体还是非正式语体;在什么条件和言语背景下采用什么语言变体,以及使用某种语言变体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地位、身份、性别、年龄、性格、立场等社会意义。而各种语言变体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是否构成独特的体系,而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社会分布,即具有共同的社会特征的人、共同的交际关系和言语背景等等。

文化语言学则对语言结构系统和言语交际行为两方面都给予同样的重视。文化语言学不仅可以包括历史变异、社会变异、地域